

清代揚州學記

張舜徽著



张舜徽著

清代扬州学记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241
3.1.1.1

3121

清代揚州學記

張舜徽著

*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紹興路54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號

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開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張 7 1/8 字數 140,000

1962年10月第1版 196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—2,800

統一書號：11074·327 定價：(十一) 0.76元

封面設計：范一辛

前 言

这本书是十多年前，我在兰州教书时，所撰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》的一部分。当时着重闡述扬州学派，原名《扬州学記》，是用文言文写的，沒有写完便停笔了，其中《叙論》部分，曾刊入《积石丛稿》（有1946年排印本）。现在重新整理、补充、修訂，写为語体文，并改用今名。关于叙述体例，有下列几点：

- 一、此书旨在闡述清代扬州学者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和治学方法，抽举几位較为重要的中心人物为主题，次要者附见。
- 二、清代扬州府治，領二州（高邮、泰州），六县（江都、甘泉、仪徵、兴化、宝应、东台）。今茲所述，不越此限。
- 三、扬州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他們的特点，都在《叙論》中首先概括地加以說明，至于詳細进行分析或批判，則分见各专章。
- 四、此书以介紹清代扬州朴学家为主要內容。近人刘师培，因与他們关联較为密切，故亦列入。最近几十年間继起的学者或现在还健在的人，例不写入。

五、书后所附一表，系依据各家年譜、传志輯述而成。但主要取其中与学术有关者列入，其他瑣事，概屏不录。

张 舜 徽

1959年12月25日于武昌

統一書號：11074·327

定 价：0.76 元

AE 41/10

目 次

前言

第一章 叙論	1
--------------	---

第二章 王懋竑	19
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 王氏生平和著述	19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二 王氏治学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努力	23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三 王氏对朱子之学的贡献	28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四 王氏最亲密的学侣——朱泽澐	35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五 王氏乡里后学的继起——刘台拱、朱彬、刘宝树、刘宝楠、 刘恭冕、成蓉镜、刘嶽雲	39
---	----

第三章 王念孙(附王引之)	52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一 王氏父子的生平和著述	52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二 王氏的训诂学	57
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三 王氏的校勘学	69
----------------	----

四 王氏最亲密的学侣——任大椿	75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第四章 汪中	83
--------------	----

一 汪氏生平和著述	83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二 汪氏对于儒家正统思想的批判	86
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三 汪氏治学的识见与规模	92
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四 汪氏家学的继起——汪喜孙	96
五 汪氏最亲密的学侣——江藩	99
第五章 焦循(附焦廷琥)	106
一 焦氏生平和著述	106
二 焦氏治学的精神与态度	111
三 焦氏治学的識见与规模	116
四 焦氏的經学和史識	122
五 焦氏的哲学思想	129
六 焦氏最亲密的学侣——黃承吉	136
第六章 阮元	142
一 阮氏生平和著述	142
二 阮氏的訓詁学	146
三 阮氏的考証学	151
四 阮氏的哲学思想	158
第七章 刘文淇(附刘毓崧、刘寿曾)	164
一 刘氏生平和著述	164
二 刘氏的經学	170
三 刘氏的校勘学	177
第八章 刘师培	183
一 刘氏生平和著述	183
二 刘氏在語言文学方面的成就	189
三 刘氏研究經学和校释群书的工作	197
四 刘氏的倫理思想和政治思想	202
附录: 清代扬州学者年表	209

第一章 叙 論

人們談到清代学术，便容易提出“考証学派”四字来概括二百七十年間学术界的主流。其实，清初几位大师，象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、刘献廷、顏元、唐甄，都具有丰富的社会思想和民族思想。规模弘伟，絕不是“考証”二字所能范围。道光以下的学者們，又大力提倡“經世致用”之学，不甘心把自己的心思才力埋葬在故紙堆里，事实上，也和“考証”絕然殊途。真正当得起“考証学派”这一名目的，只能算是乾隆、嘉庆年間，亦即十八世紀中叶到十九世紀初期的学者們。这一时期的学术界，过去旧史家称之为清代学术的黄金时代。但是他們自少至老，只是为考証而考証，完全脫离了现实生活。只知有古，不知有今。当时树立了“汉学”的旗帜，在煩瑣的考証工作內兜圈子。《四庫全书总目提要·經部总叙》指出当时治学情况，认为“其弊也瑣”。用一“瑣”字概括当时学者們的流弊，是比较恰当的。

我們要問：为什么乾嘉学者們愿意将自己有用的岁月投入煩瑣的考証工作中呢？这是有他們的时代背景和不得已的苦衷的。当清代初年，屡兴文字獄，如康熙年間的庄廷鑑、戴

名世兩案，以及雍正、乾隆年間的查嗣庭、呂留良、胡中藻、王錫侯、徐述夔等案，大批學者文人被屠殺了。於是讀書識字的人們，人人自危，首先不敢研究明末史事，怕觸犯忌諱；也不敢多寫詩文，怕無故惹禍。於是他們集中精力研究經學，從事校勘和箋注的工作。由此而旁及文字、音韻、訓詁、天算、地理、金石、樂律、典章制度等方面。專家輩出，著述日丰。凡經過他們整理的古書，解釋明確，使讀者節省了許多精力。他們在搜集、辨別、整理材料上，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。可是他們共同的缺點，那就是迷信古人的思想和煩瑣考証的方式，對乾嘉以下兩百年來的學術界，起了不好的影響和作用。

近人研究清代學術史的，莫不認為“漢學”興起時，有吳、皖二派。吳派以惠棟為首，皖派以戴震為首，卓然稱兩大師。很少有人注意到揚州學者們在清代學術界中所起的重大作用。我從前寫《揚州學記》時，在序言中說過：

“余嘗考論清代學術，以為吳學最專，徽學最精，揚州之學最通。無吳、皖之專精，則清學不能盛；無揚州之通學，則清學不能大。然吳學專宗漢師遺說，屏棄其他不足數，其失也偏。徽學實事求是，視夫固泥者有間矣，而但致詳于名物度數，不及稱舉大義，其失也褊。揚州諸儒，承二派以起，始由專精匯為通學，中正無弊，最為近之。夫為專精之學易，為通學則難。非特博約異趣，亦以識有淺深弘纖不同故也。鄭康成之所以卓絕以此耳。清儒專門治經，自惠、戴開其先，天下景從而响和者，無慮皆能盡精微而不克自致于廣大。至于乾隆之季，其隘已甚，微揚州諸

儒起而恢廓之，則終清之世，士子疲老尽气以从事者，杂猥而已耳，破碎而已耳。末流之弊，不知所届，庸詎止于不能昌明經訓已乎？吾之所以欲表章扬州之学，意在斯也。”

这虽然是我早年的见解，也还道出了扬州学术值得重视的原因。的确，吴、皖两派学者所走的路，是比较窄的。特别是惠栋，盲目崇拜汉人，无原则地把汉人旧说看成至宝。由好古、信古，乃至佞古、媚古。这种弊病，也只有扬州学者能够大胆提出加以批判，如焦循和王引之都对惠氏治学方法指责过^①。戴震治学范围比较惠栋宽泛些，方法也比较缜密，有实事求是的精神。他的优点，全被扬州学者们继承了，并且发展了。扬州学者治学的特点，首先在于能“创”，像焦循的研究《易经》，黄承吉的研究文字，都是前无古人，自创新例。其次在于能“通”，像王念孙的研究训诂，阮元的研究名物制度，汪中的辨明学术源流，都是融会贯通，确能说明问题，这都是吴、皖两派学者们所没有，而是扬州诸儒所独具的精神和风格。他们这一类的治学方式与方法，如果拿今天的尺度去衡量，诚然有他们的缺点和错误，但是对当时那般篤信謹守、褊狭拘隘的学术气氛来说，仍然有它客观上的进步作用。我们今天对扬州学派所以还有重视的必要，道理便在这里。

还有一点特别应该指出的：乾嘉学者中绝大多数，从事考证名物、训诂、典章制度，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，有它的历史

① 详见《王文简公文集》卷四《与焦理堂先生书》。

地位。但是流于煩瑣，失掉了十七世紀學術思想界弘偉活潑的氣象，談不上個性的發展和見解的創辟。這應該說是十八世紀的中國學術思想界晦塞的一面。揚州學者們在這方面彌補了這一缺憾。像汪中、焦循、阮元都能大膽的對一些問題，特別是對倫理方面的問題，提出自己的看法，繼皖學戴震之後，給宋明唯心主義的理學以嚴厲的批判。所以揚州諸儒的哲學思想部分，更是值得我們大書特書的。

過去許多學者談到揚州諸儒哲學思想時，認為是受戴震的影響很大，也可以說直接淵源於戴氏。這種論斷，似乎是可以成立的。一則由於戴氏留寓揚州最久，早已將他的議論主張帶到了揚州；二則揚州幾位大學者，如王念孫是戴氏弟子；任大椿是戴氏同事；焦循雖出生略後，但一生最推尊戴學，我們只看他所做的《申戴篇》，可以肯定他的治學，是私淑戴氏的。那末，揚州學術，無疑是與戴震有比較深厚的關係了。如果再上推一下，戴氏的學說思想，又是源出誰家呢？也是我們應該進一步探索的問題。

當1923年，值戴震誕生二百周年的時候，梁啟超寫了幾篇論文來紀念他。其中《戴東原哲學》一篇^①有這樣一段話：

“我深信東原的思想，有一部分是受顏李學派影響而成。

雖然在他的著作中一點實証也找不出來，但我覺得這件事有可能性。試大略尋一尋他的綫索，一、方望溪的兒子方用安為李恕谷門生，望溪和恕谷論學不合，用安常私

① 載《飲冰室合集》，文集第十四冊，《飲冰室文集》之四十。

自左祖恕谷，是桐城方家有能传顏李学的人。东原和方家人素有来往，方希原即其一（集中有《与方希原书》），所以他可以从方家子弟中间接听见顏李的緒論。二、恕谷很出力在江南宣传他的学派，当时贊成反对两派人当然都不少，即如是仲明这个人，据《恕谷年譜》知道恕谷曾和他往复論学，据《东原集》又知道他曾和东原往复論学。《仲明年譜》中，也有批評顏李学的话。或者东原从他或他的門下可以有所聞。三、程綿庄是当时江南顏李学派的大师，綿庄死的时候，东原已三十岁了，他們两位曾否见面，虽无可考，但程綿庄和程魚門是摯友，魚門、东原交情也不浅，东原最少可以从二程的关系上得聞顏李学说乃至得見顏李的书。

梁氏这段話，完全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主观推测。所提出的三个假設，沒有理由可以成立。当时顏李之学，并没有盛行于江南。即使有人见过顏李的书，不一定都尊信其說。像梁氏所举的程魚門（即程晋芳），虽很推崇程廷祚，但不贊成顏李之学。《勉行堂文集》中的《正学論》，便力詆顏李，并駁戴震，大为程朱辨冤。所以他虽明知程廷祚得力于顏李，在替廷祚作墓志銘时，竟不提及顏李之学。可知当时学者們凡是知道有顏李之学的人，不等于便会引起宣传和介紹的作用。又何由能肯定戴震是从朋友处間接得了顏李之传呢？后来胡适写《戴东原的哲学》，和梁启超的看法是一致的。梁书成于1924年一月十九日；胡书脱稿于1925年八月十三日；当时同住北京，必然是商討过的。

梁启超、胡适对这一问题錯誤看法的原因有二：一則看到戴望《顏氏学記》有云：“乾隆中，戴吉士震作孟子緒言，始本先生此說言性而暢发其旨。”便肯定戴震学說的全部，都渊源于顏习斋而推衍之。二則那时杜威来中国讲学不久，宣传了资产阶级的唯心的实验主义教育思想，成为一种时髦学說。梁启超、胡适等人，认为我国三百年前的顏李学派，和杜威們所提倡的，有許多相同之点，而且有些地方比杜威所談，更加彻底。于是梁、胡諸人，在当时大談其“顏李之学”，使之成为最时髦的学問。既把“顏李”提得很高，不能让这一学派沒有传人，于是硬拉戴震来作顏李的替身。这种唯心的“大胆假設”的說法，显然是錯誤的。

况且戴震的学术和思想体系，和顏李学派有根本不同之点。顏元是坚决主张从实事实物中去实习，去实行，反对以誦讀著述为学。所以他在《存学編》里大声疾呼地說过：

“以讀經史，訂群书，为穷理处事，以求道之功，則相隔千里；以讀經史，訂群书，为即穷理处事，而曰道在是焉，則相隔万里矣。”

这是何等激烈的言論！他的学生李塨，虽未能尽守师說，然治学途径，究与后来朴学家們异趣。像戴震在《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图》中所說：

“故訓明則古經明，古經明則賢人、圣人之理义明，而我心之所同然者，乃因之而明。賢人、圣人之理义非他，存乎典章制度者也。”

这分明說明了戴氏精神所注，是圍繞在故訓和典章制度之間

做工夫的。顏氏所反对的“讀經史，訂群书”，恰是戴震所強調的。这自然是他們根本分歧之点。戴氏早年，尙守宋儒义理，后虽自出己见，別标新說，議論有与顏李相通处，只能說是偶合，沒有証据硬可肯定戴学出于顏李。

大抵清代朴学家們治学的规模次第，莫不奉顧炎武为大師。这可从三方面說明問題：一、顧氏宗仰朱熹^①，而朴学家如吳之惠棟，皖之江永，都继承了这一传统。惠棟的父亲惠士奇，自书楹联有云：“六經尊服郑，百行法程朱。”^②江永既替《近思录》作注，又继承朱熹之志，成《礼书綱目》。戴震既問学于江永，宗尙相同。平日教人研究《周易》，当讀程子《易传》^③。可知朴学諸儒，不独惠、江等人推尊程朱，連戴震平日对宋儒之书，也并不全盘否定，这明明和顧炎武的见解是一致的。二、顧氏平日強調：“讀經自考文始，考文自知音始。”后来乾嘉学者們无一不是从文字音韵入手，戴氏更提倡最力。三、顧氏在《答施愚山书》中說过：“古之所謂理学，經学也。”意思是說：古人所謂理学，是从經学里面提炼出来的。应该从群經中寻找义理的旧解。像戴震的《原善》、《孟子字义疏證》，便是沿着这条道路而取得的成功的作品。扬州諸儒中如焦循的《孟子正义》、《論語通释》；阮元的《論語論仁論》、《孟子論仁論》；都是远师亭林、近法戴氏，用归納的方法，引据群經旧义來說明問

① 詳拙著《顧亭林學記》，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。

② 江藩《國朝宋學淵源記》引。

③ 見段玉裁所編《戴東原先生年譜》。

題的。也都是從經學中推見古代義理之源，使不為宋明以來后起之說所雜。這和顏李學派的專重實用、鄙棄書傳的做法，截然不同。所以揚州學者們哲學思想的體系，實淵源於戴震，這是可以肯定的。戴學體系，又實遠承顧炎武的余緒加以發展；和顏李之學，關係不大。

揚州諸儒，不獨哲學思想淵源於戴氏；其他學術方面，也都是衍戴學遺緒而進一步發展起來的。劉師培在《南北考証學不同論》中說過：

“戴氏弟子，舍金壇段氏外，以揚州為最盛。高郵王氏，傳其形聲訓故之學；興化任氏，傳其典章制度之學。王氏作《廣雅疏証》，其子引之申其義，作《經傳釋詞》、《經義述聞》，發明詞氣之學。于古書文義詰詘者，各從條例，明析辨章，無所凝滯，于漢魏故訓，多所審覈。任氏長于《三禮》，知全經浩博難罄，因依類稽求，博徵其材，約守其例，以釋名物之糾紛。所著《深衣釋例》、《釋縉》諸篇，皆博綜群書，衷以己意，咸與戴氏學派相符。儀徵阮氏，友于王氏、任氏，復從凌氏廷堪、程氏瑤田問故，得其師說。阮氏之學，主于表微。偶得一義，初若創獲。然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貫纂群言，昭若發蒙，異于餽釘猥瑣之學。甘泉焦氏，與阮氏切磋，其論學之旨，謂不可以注為經，不可以疏為注。于近儒執一之弊，排斥尤嚴。所著《周易通釋》，掇刺卦爻之文，以字類相屬，通以六書九數之義，復作《易圖略》、《易話》，發明大義，條理深密。雖立說間鄰穿凿，然時出新說，秩然可觀，亦戴學之嫡派也。”

刘师培的这段话，比较符合事实。我们今天肯定地说，扬州学派是在戴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似乎这一论断可以成立了。

戴震之学，出于江永；江永是推崇朱熹的。他们吸取了朱熹学术中积极的有用的一部分，便发展成为朴学。戴震对于宋儒言理，不敢苟同。又勇于在哲学思想领域中起来革命，想建立一套新的理论体系。当时学者，很少有人响应他。独扬州诸儒如焦循、阮元辈，从而发展它，使学者们对于有关伦理的字义，有个新的认识，不致为宋明理学诸儒唯心之论所囿。这在两百年前来说，自然有它的进步意义。

总之，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，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相互交错的时期，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，形成了清帝国的统治相对稳定的局面。但是同时，资本主义的幼芽，市民的力量，农民的反抗活动，却一直不可阻遏地上升着。戴震、汪中、焦循、阮元等人哲学思想的出现，充分体现了市民反抗封建压迫的情绪，无疑是当时历史形势的具体反映。

人们会要问：那种富有进步意义的哲学思想，为什么戴震之后，只有扬州学者们首先继承它和发展它？这里，可以用扬州学者的话来回答这一问题。江都薛寿《学诂斋文集》卷下《读面觞录书后》有一段这样的话：

“吾乡素称沃壤。国朝以来，翠华六幸。江淮繁富，为天下冠。士有负宏才硕学者，不远千里百里，徕来于其间。巨商大族，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。兼有师儒之爱才，提倡风雅。以故人文汇萃，甲于他郡。”

的确，扬州在当时是东南地区的大都市，交通发达，商业繁荣。